

李幼蒸 著

*Structure and Meaning*  
(Enlarged Edition)

结构与意义

(增订版)

下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文海

*Structure and Meaning*  
*(Enlarged Edition)*

结构与意义  
下卷  
(增订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结构与意义/李幼蒸著. —增订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300-18262-9

I . ①结… II . ①李… III . ①哲学-研究 IV . ①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1222 号

### 结构与意义 (增订版) (上、下卷)

李幼蒸 著

Jiegou yu Yiyi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010 - 62511770(质管部)	
电    话	010 - 62511242(总编室)	010 - 62514148(门市部)	
	010 - 82501766(邮购部)	010 - 62515275(盗版举报)	
	010 - 62515195(发行公司)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56.25 插页 6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765 000	定    价	138.00 元 (上、下卷)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李蒸遗像，摄于1964年北京

1930年代，我的父亲、北平师大校长李蒸在某次校长讲话中指出：“师大对国家的贡献不是煊赫的，而是潜伏的，永久的。为国家树人大计，培植下优良的种子”。



1958年五一劳动节同游颐和园

1958年春由天津大学返京度假，父亲邀我同游颐和园时所摄。

下 卷

( 1980—1988 )



## 自序

记得 1978 年初认识杜任之先生不久，我们就一起商讨如何编选五十位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予以介绍。杜先生自 50 年代末开始就主持现代西方哲学的书刊译事。大约在同一时期我放弃了建筑工程的学业，转而研习现代西方哲学，杜任之先生主编的《哲学译丛》即为我当时爱读的内部刊物之一。不想后来我们竟然有机会共同合作向国内千万读者首次较全面地介绍这些长期被限制讨论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内心的兴奋是不言而喻的。

十年前的今日，文化学术园地在“文革”劫余之后一片荒芜，可谓百废待举。我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现代西方哲学这个荒废已久的领域应当尽先恢复。当时“四人帮”肆虐时期结束未久，文化形势还不明朗，对西方学术研究的政策和规定还不易把握。幸赖杜任之先生的资望和魄力，率先倡导，有关研究工作才得以逐步展开。在杜任之主编的论文集中考虑承担项目时，我首先选择了胡塞尔和列维-斯特劳斯，他们两位分别是德国现象学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大致说，前一流派以探讨意义问题为主，后一流派则以探讨结构问题为主。不想自此以后，结构和意义即成为我十年来大部分著、译工作的主要方向。只是在为本文集选定了书名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研究方向原来已由我最初选择撰写的这两篇文章预示了出来。

整整十年过去了。这是紧张忙碌、不停工作的十年。对我来说，

哲学不再是独处自遣的慰藉，而成为必须与之尽力周旋的强大压力。在选择著译主题时，完全依照个人的爱好与评判。我只打算把我认为最重要的、尚不易为人理解的和难度较大的西方人文思想尽先介绍给国内读者。当人们终于再次获得了求知的机会时，应当毫不犹豫地向当前世界知识主流靠拢。以世界，而不只是以处于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作为观察视野，这决定了过去十年来我所选择的论题和考察方式。

在论述方式上，我试图注意全面性和关联性，使人们阅读后能对一家一派的思想获得较全面的了解。在论述哲学时，我设法指出哲学各派之间以及哲学和其他学科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在论述其他人文思想时，也注意指出它们与哲学的关联。因此我希望，这近 30 篇文章全体可以约略显示出今日人文科学各学科间的广泛交叉和密切融通的态势。读者不难看出，我所论述的人物和流派主要属于“欧陆”思潮领域，但我仍注意在西方学术整体中安顿欧陆各家的位置，以说明其特性和价值。十年来我的各种论述大多与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有关，我认为欧洲大陆哲学和一般人文思潮包含着更为丰富、更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探讨，因此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在哲学这一编里主要包括了有关欧洲大陆主流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和解释学的文章，这些流派和与它们有关的诸多学科彼此之间关系密切，宜于参照比较。在美学的一编里，论述了结构和记号分析法在电影理论和文学理论中的运用，在我看来这一研究类型是今日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在史学的一编里，各篇文章主要讨论史学理论的性质及其在人文科学大家庭中占据的突出地位。所提出的史学理论分类学概念对于理解人文科学整体结构也是重要的。在比较研究一编里的几篇文章是一些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讲演和提交的论文，除一篇外均未在国内发表过。关于诗歌和戏曲的两篇是运用结构和符号分析法研究中国传统文艺问题的尝试。另外三篇都涉及中西学术关系方面的讨论，反映了作者对于中西文化研究“战略”的认识。

本文集以结构和意义两词为名，前者强调对象的整体性和关联

性，后者强调“人的科学”中与价值和理解有关的特性。在我看来，结构和意义是人文科学跨学科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个最高范畴，故宜于作为本书书名。尽管本文集各篇文章反映出了某种主题和方法上的一致性，它们当然不是在一种有意识的统一计划中逐次完成的。过去十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现代西方经典翻译工作上了，加以诸多琐事缠身，因此并不可能从容安排各项研究计划。其实每篇文章都是主观动机、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和偶然机遇综合作用的结果。即使如此，我仍然希望读者在耐心读完他所感兴趣的篇章后能察觉到作者的基本学术观点和主张，其统一性已体现在对各篇主题的选择、材料的主次安排和分析方法之中了。

李幼蒸

1988年3月于北京，与妻子沿西伯利亚  
大铁路绕道远赴西柏林前夕

## —— 导 论 ——

# 人文科学的跨学科方向

## 一、开放的哲学

1983年3月在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区分会年会上，理查·罗蒂曾组织了一组讲演，题名为：哲学之终结。讲演人分别评述了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福柯和德里达的哲学批判思想。哲学今日是否还有存在之必要，这是目前西方学者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但是，如果进一步考虑就会看到，这个问题至少可分为以下三个问题。这就是，传统西方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否已大部分失效；传统西方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是否应转入其他人文学科内研讨；以及更具体地说，现有的哲学专业构成是否得当。应当看到，这是三个不同的问题，尽管彼此之间都有联系。

自从黑格尔的时代过去以后，体系哲学（它是西方哲学逻辑传统的必然产物）就失去了生命力。在古典哲学大厦解体的废墟上树立起了成百上千的门类科学，一百多年来人类的知识获得了以往无法比拟的伟大进步。从某一角度看，科学的进步是在摆脱了哲学及其学科限定性的羁绊后才得以实现的。在今日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

里，一般研究者并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知识。两三千年一直作为人类知识主宰的哲学，今日已被大多数知识科目排出门外。至于现代社会中的广大公众，对他们来说，哲学成了空疏无用之物，或者仅是一种修辞装饰或精神消遣而已。

但是，哲学仍然存在着。在任何文化发达的国家里，哲学问题既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对象，又是一门在文化系统中占据着稳固地位的职业。尽管成百上千个具体学科都在研讨与传统哲学主题无关的问题，哲学却依然看守着自古遗留下来的哲学遗产，并继续在其基础上进行着翻修和营建工作。20世纪以来，门类科学的繁衍壮大，已使文化和学术的环境根本改观，哲学不断小心翼翼地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寻求着个性身份、关系地位以及作用功能。同时它也收敛了昔日的崇高尊严，而向门类学科虚心求教了。放弃了过时的思想框架，不等于放弃了目标和追求，哲学的生命力和勇气恰恰表现在它善于和勇于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新追求适应。哲学审时度势，认真研究学际之间的联系与分别，使自己的目标、课题和方法更为合理和有效。结果，谦逊和真诚将使哲学恢复其适当的尊严；的确，它不再能成为万学之主而视众学为仆，但它也不致“时代错误地”勉强去支撑没落贵族的门面。哲学认识到，一个新的科学大家庭已然形成，它应在其中找到作为平等一员的位置。

自19世纪末叶起，哲学就开始受到各门科学发展的刺激，百年来的众多哲学思潮往往表现为哲学对门类科学学术新发展的各种主动和被动的反应。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完全独立和有机的整体学术世界已完全脱离了传统知识体系，在“自然哲学”这个传统领域里，哲学反倒成了自然科学的追随者。后者无待于前者，前者却有求于后者。社会科学是在自然科学直接激发下形成和发展的，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军事等数百个专业领域里，百年来已形成了与哲学无直接关系的专门科学系统，它们直接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命运。由前两大科学世界创生和支配的工业技术世界更已成为今日人类社会的实体和骨架，并成为大多数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因此，从社会整体来看，哲学的领域和作用与古代相比正是一落千丈了。

上面对哲学形象的“贬低”是从实用角度考察的结果。哲学既无物质上的用处，也无社会上的势力，因此在一个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社会里，哲学的确是无足轻重的。不过哲学不需因此而自卑，反躬自省之后，哲学会认识到自古以来哲学的基本宗旨并非在于谋求物质性的目标。在素朴时代哲学尽管也思考自然和社会的物质现实，其根本的关切仍然在精神方面。人类知识的进展使得求知的目标和方法不断分化，于是哲学中物质方面和技术方面的原初兴趣逐渐导致种种具体科学的建立。哲学原有地盘的划出反倒使哲学的实体纯化；现在我们所说的“哲学”，就目标范围而言，只是古代哲学的一个部分，但仍然是一个（在精神上而不是在物质上）重要的部分。另外，在精神领域里，哲学也已割让出了大片地盘，精神方面的目标在由各种新兴人文学科接管之后也获得了极大发展。这样我们就有了历时百年之久的“精神科学”、“文化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此精神科学的领域里，哲学保留着作为其中的一员的地位，当然到目前为止它仍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对哲学形象的评估，因此也就是对人文科学形象的评估。一百年来，当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之后，人文科学仍令人赞叹地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域和身份、独立和尊严。人文科学从来没有成为自然科学和物质生活的附庸，它坚持着独立自主的目标和路线，并吸引维持着大批才智之士“逆流”而进。当物质高度发达，社会长足进步之后，人们必然会认识到，物质需求只是人类初级的需求，高级的需求将仍然出现在精神世界里。因而人文科学恰恰会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趋于繁荣，当政治和军事冲突减退或消除之后，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加强。于是，哲学不必在物质科学里去寻求往昔的尊严，亦不必去寻求权势和地位，而应在精神科学里寻找其安身立命之所。

我们不妨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 40 年里，哲学在后一方的探索中已取得显著成就。同时，哲学的成功，恰恰“有机地”也是人文科学全体的成功；人文科学整体化趋势的加强，使一切组成学科均从中受益并更明确地认识到彼此的依赖性。人文科学各学

科在研究目标、方法和科研活动诸方面的积极融通促进了一体化和交流化的实现。各门学科的研究目标、对象、范围和途径都成为开放性的，而不再是封闭性的了。学科界限弹性增强，学际“外交”空前活跃。因而作为人文科学大家庭一员的哲学也开始变成一个开放的领域，任何坚持哲学“固有”边界、“正当”课题、“纯粹”性格的主张都有背于人文科学目前的主要趋势。

在这样的认识下，“哲学”仍是一个明确的工作领域，这是由其学术目标和技术安排两方面决定的。在这个工作领域里，我们既从事唯独哲学才进行研究的课题，也考虑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各类准哲学问题。当许许多多传统哲学信条受到彻底批判之时，这种批判活动本身仍发生于这一哲学工作领域内，因此也仍然“属于”这一领域。同时，哲学仍然比其他人文学科更适宜于处理与若干学科共同相关的理论问题。此外不同层次上的元理论研究，即对各种理论本身的反省活动，仍然可纳入哲学工作领域。工作领域概念和体系构筑概念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由于否定了过时的哲学体系而连哲学工作领域也一齐关闭。这是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的。

## 二、跨学科研究和方法论

“哲学”这个学科名称，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学派、不同学科会赋予它很不相同的内涵和外延。争论哪一种哲学定义最为适当是困难的。如果强调哲学在人文科学全体中所具有的相对位置，则可以使我们更有效地把握哲学学科的范围和功能。所谓跨学科研究，首先就是指从多学科角度来考察与它们共同相关的问题，这是指课题本身的多学科性。

跨学科研究的另一个涵义是方法论的多学科性。其实这与前一涵义互为表里，但更具有实用性。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可属于若干不同学科，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各相关学科的不同方法可加以综合运用以解决共同性的问题。这样，大批的问题可越过学科边

界互相串联起来，而各学科的众多方法又可互相参证以提高解决问题的效力。这种课题与方法相互重叠和交叉的现象，就是学际交流现象。强调学际交流是与强调专业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对立的。百年以来，在各学术领域内部形成了成百上千个专门学科。各门学科都已建立起一套套确定的科研体系和研究规程。在相对稳定的专业科研体系内，理论构成和研究技术均得到了强化，确定的理论准则和操演程序使得研究产品源源而生。学科领域的制度化又促使专业精神不断增强。这样，一批批卓有成效的学术专家产生了。跨学科方向口号的提出，首先就是针对趋于极端的专家精神的。专家是既定体系和程序的实行家，他们对习以为常的体系和程序本身往往不加以反省和批评，只是孜孜于操作运演。因此，跨学科方法论的强调在于指出，固守专业壁垒会削弱科研成果的价值，并使偏于技术性的成就阻挡了思想性的追求。

这样看来，跨学科方法论不只是改进研究方法之谓，它同时也涉及基本的科研态度，即一种思想性重于技术性的态度。它不只追求一般成就，而是致力于探索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成就。正是为了克服技术性成就的局限，它才注意到本专业以外的活动，它才增加了扩大关注范围和进行比较的意识。因而跨学科方向也是比较研究的方向，它可涉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个人之间在问题、观点和方法诸方面的比较活动。

尽管跨学科研究、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与一切研究活动有关，但作为一种重要方法论的提出只有 30 年左右历史。它是作为专业分割趋势的“反动”出现的，如今已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个领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一方法论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的作用。众所周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专业化的发展上非常成功，在这两个领域中科学的进步一直是与专业分工的强化同时发生的。对它们而言，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只能在已确立的专业领域内适当地进行。换言之，在这两大领域内专业分工的效力和可靠性仍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在人文科学领域里，一向比较松散的专业界限正当要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靠拢从而使

自身进一步规范化和专门化时，跨学科方法论的提出却使这一领域受到了强烈冲击。换言之，在较高精神层次上的科学研究面对着更复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其复杂性表现在，各个学科一方面要像一切科学一样进一步专业化和技术化，另一方面又要同时注意学际关联问题。每门人文科学必须同时既向内部进军又向外部进军，既强化“内政”又增进“外交”。它们必须经受这种强度较大的张力，它们必须同时处理好思想性与技术性的问题。

按照上面的描述，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总的方向上看，大陆哲学比分析哲学表现出了更强烈的跨学科倾向，因此包含着更大的思想活力。分析哲学由于主要取法于数学和自然科学，追求观念和方法的科学化（自然科学化）、稳定化和制度化，因而对外易于采取封闭政策，执守既定理论和方法程序，对人文科学其他领域的活动和进展较不关心，并满足于对“哲学专业”堡垒的营建，从而表现出了较明显的保守性。当然，从具体工作考察，分析哲学正因以科学为楷模，在研究的确定性和严格性方面成绩卓著，积累了大量知识成果。但从一般趋势看，分析哲学对人文科学领域内其他学科兴趣很淡，因而在人文科学整体中地位较弱。

让我们来看看几种欧洲大陆主流哲学。严格说来，结构主义本来不算是哲学，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跨学科学术研究方向的标志。解释学在历史上已禀具综合性格，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成为另一典型的综合人文研究场地。现象学算是一种现代最标准的哲学活动，它的基本观念和研究方式与德国古典哲学颇多一致之处。然而60年代以来，现象学运动进一步突出了方法论性格，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选择各个领域作为研究对象，跨学科趋势日趋明显。再来看看性格更加暧昧的符号学领域。由于它强调本身只是一种分析方法，它的适用范围较前三个领域更为广泛，在跨学科研究方向上最为激进。

另外，从流派繁多的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潮来看，我们也容易看到类似的倾向。一方面马克思哲学本身就是最早产生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又与前述各流派密切相关。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的新阶段何以发生于

60年代的欧洲大陆了。

人文科学跨学科方法论的提出，加强了这一领域的整体意识。从哲学角度看，哲学研究将变成人文科学整体研究的一个部分（当然是一个主要部分）。哲学问题自然地也就是人文科学全体的问题，虽然同一问题与各学科的关联有程度上的区别。为了提高各门人文学科研究的水准，我们着手探讨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跨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反过来又不断促成人文科学内部构成的变动。由此可见，跨学科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实际上关系到人文科学的未来整体发展，具有极高的科研方略意义。

### 三、中西文化及其哲学

今日我们常常听到有关中西文化碰撞、对峙、冲突等等说法。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关系问题从19世纪末开始已引起我国知识分子的关切，自20世纪20年代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大量涌入后遂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突出话题。我国当时所有主要的哲学家无不对此加以讨论，或者强调西化，或者强调国粹，或者强调融合。今天，我们似乎又面临着同样的情境，只不过政治、经济、国际环境已大不相同了。首先我们应当明确，今日所说的中西文化碰撞之类的提法主要是发生在中国的现象，从世界范围看并不存在这种文化对峙情势。因为中国文化对外国的影响还很有限，绝大多数外国人不仅不通中国语言，而且对有关中国的知识也所知有限。所以这个问题首先是主要对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大多数西方学者和哲学家并未感受到什么中西文化的冲突。但是另一方面，从文化哲学角度看，中西文化思想的对峙又是一个潜在的重大的问题。因为中国这个实体有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所积累的文化资料不计其数，这样一个历史上辉煌的庞然大物是不会在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中失去价值的。我们不妨说，从社会政治角度看，中西文化冲突更多的是中国内部的一个问题，而从哲学文化的角度看，则迟早会具有世界意义。